

清初扎萨克喇嘛制度的形成

— 从内外两库伦体制到多库伦体制 —

池 尻 阳 子

Form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Jasak Lama system in the early Qing period

IKEJIRI Yoko

This paper clarifies how the Qing administrative system for Tibetan Buddhist monks, called the Jasak Lama system, was formed and implemented during the early Qing period.

Jasak Lama (Man. *jasak i lama*) is a professional rank established by the Qing dynasty among Tibetan Buddhist monks. *Jasak* means ‘administrator’ in Mongolian (Mon. *jasay*), and had also been used to refer to the head of the Mongol banner during that period.

To administrate the Tibetan Buddhist community and their activi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Jasak Lama system was generally applied to the Tibetan Buddhist monks staying inside the Qing territory. Preceding studies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is system was introduced in four main areas during the Shun-zhi era (1643-1661), Beijing, Mukden, Hohhot, and Hure Banner, before being spread to other places. However, this paper clarifies that administrator court lamas had already been evidenced during the Hontaiji era (1626-1643), and it can be regarded of as the initial step of the Jasak Lama system.

This paper also clarifies that the Qing dynasty adopted an “inner and outer two Kuren (*a Manchurian term that means ‘house’) structure” in its earliest stages. Subsequently, after the Qing’s conquest of Beijing, the Qing dynasty extended the Jasak Lama system’s coverage along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Qing’s territory, and eventually adopted a ‘multi-Kuren structure’.

This paper proves that the monks who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he Jasak Lama system and took active roles in Qing dynasty policies concerning Tibetan Buddhism in the early period had an intricate relationship with some monasteries of the Bsam-blo group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Amdo area. As such, the valuable activities of the eastern Amdo monks as forerunner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Jasak Lama system in the Qing dynasty.

キーワード：清朝 (the Qing Dynasty)、チベット仏教寺院 (Tibetan Buddhist monasteries)、扎薩克喇嘛制度 (the *Jasak Lama* system)、フレー体制 (*Kuren* structure)

前言

“扎萨克喇嘛制度”是清朝对藏传佛教寺庙和喇嘛施行的一种管理体系，设置于北京、盛京、归化城（呼和浩特）、锡勒图库伦、热河等藏传佛教寺庙比较集中的城市。由于清朝在这些地方施行以扎萨克大喇嘛（满文：jasak i da lama）为顶点的秩序体系，本文称之为“扎萨克喇嘛制度”。¹⁾ 过往研究多将这个制度称为“驻京喇嘛制度”，笔者则重点介绍清初藏传佛教管理结构形成过程的全景，而不仅限于以京师为中心的喇嘛管理结构的确立。因此，弃用“驻京喇嘛制度”，选用“扎萨克喇嘛制度”这一名称。

虽然针对扎萨克喇嘛制度的研究并不多，迄今为止张羽新、赵云田等清代西藏以及蒙古政教制度的专家提到这个清朝独自设立的秩序体系，并介绍其职位名称和设置地点，章嘉呼图克图等著名驻京呼图克图的活动等制度的概要。²⁾ 近年来，有关清代藏传佛教寺庙管理结构的课题引起各方学者广泛的关注。例如，罗文华、陈晓敏两位学者研究驻京喇嘛制度，论述以驻京高僧为轴心运转的秩序体系的结构。³⁾ 内蒙古历史学者胡日查则详细阐述清代内蒙寺庙管理体制，并仔细分析清朝蒙古寺庙管理政策的演变及其对蒙古社会的影响。⁴⁾

上述近年的研究均充分利用各种档案资料，介绍有清一代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制度的结构和全景，可谓成果显著。但关于清初扎萨克喇嘛制度的概况说明和其依据仅限于《理藩院则例》等后代史料，对扎萨克喇嘛制度的渊源和形成过程也没有十分关注，研究尚不够全面。因此，有关扎萨克喇嘛制度形成过程的课题，尤其是章嘉呼图克图系统来朝之前的情况，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主要利用清初各种档案等原始资料和同时代的蒙文、藏文等资料，以清初藏传佛教界的人员编制为中心，探讨清初扎萨克喇嘛制度的形成过程及其历史影响。

一 清朝藏传佛教管理结构的基础——太宗与藏传佛教僧——

据《大清会典》记载，“扎萨克喇嘛”一职最早出现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⁵⁾ 然而，在入关之前的太宗时代，该职位已呈现雏形。本章讨论作为日后清朝藏传佛教管理结构基础的太宗时代藏传佛教喇嘛的活动和职务。

1) 本文摘自笔者在2013年出版的《《清朝前期のチベット仏教政策：扎萨克喇嘛制度の成立と展開》[日语，汲古书院]一书，并且修改而加工新的成果。

2) 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赵云田：《清代蒙古政教制度》，中华书局，1989年。

3) 罗文华：《清代驻京喇嘛管理机构考略》，载《明清论丛》第4辑，2003年，第252-261页；罗文华：《龙袍与袈裟》，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陈晓敏：《清代驻京喇嘛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

4) 胡日查：《清代蒙古寺庙管理体制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13年。

5) 康熙《大清会典》卷144，理藩院3，柔远清吏司。

很多学者指出，在太祖努尔哈赤（满文：nurhaci 1559-1626）时代，藏传佛教文化通过和漠南蒙古交流逐渐传布满洲贵族层。到太宗皇太极（满文：hong taiji 1592-1643）时代，不少藏传佛教喇嘛到访辽东满洲政权，使皇太极逐渐了解到其极大的政治影响和重要性。

据《满文老档》等史料记载，太宗特别重视西藏喇嘛萨木鲁阿兴满殊习礼（藏文：bsam blo a zhang manydzu shri 1550s-1636，满文史料中称其为“manjusiri kütuktu 满殊习礼呼图克图”）。萨木鲁阿兴满殊习礼是主要在东部蒙古喀喇沁等地弘法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⁶⁾ 文档中散见关于太宗会见和表示礼遇的事例。⁷⁾ 萨木鲁阿兴满殊习礼从太宗获准在法库山附近领有游牧库伦（满文：kuren，蒙文：kūriy-e），⁸⁾ 后来移居今天的库伦旗所在地，即后来内蒙古库伦旗的原型。⁹⁾ 库伦旗，清代正式名称为锡勒图库伦，是清朝最早施行扎萨克喇嘛制度的清初藏传佛教据点之一，详情后述。

崇德元年（1636年）8月15日，萨木鲁阿兴满殊习礼圆寂，终年80余岁。接到讣闻后，太宗派遣毕力克图囊素喇嘛（蒙文：biligtū nangsu blam-a）和察干喇嘛（蒙文：čayan blam-a）前去满殊习礼库伦吊唁。¹⁰⁾ 这两名喇嘛是太宗特别信任和重用的藏传佛教喇嘛，其业绩和职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扎萨克喇嘛制度。

日本学者石滨裕美子据《五世达赖喇嘛传》认为，毕力克图囊素喇嘛是藏传佛教萨迦派俄尔支派（藏文：ngor pa）的还俗僧。¹¹⁾ 毕力克图囊素喇嘛最伟大的业绩是在盛京主持修建实胜寺和四塔寺，其中实胜寺是太宗为供奉从察哈尔部带回来的大元帝师八思巴世传的麻哈噶喇尊像修建的寺庙。对清朝来说，它是对察哈尔胜利纪念碑，可证明清朝作为蒙古盟主的正统性，具有极大的政治作用。关于毕力克图囊素喇嘛负责这项重要工程的缘由，石滨裕美子认为是毕力克图囊素喇嘛属于萨迦派系，所以适合供奉和萨迦派有因缘的麻哈噶喇尊像。¹²⁾ 胡日查介绍了清朝在盛京设置喇嘛印务处前期，太宗下令从内蒙古各部抽调喇嘛驻锡实胜寺的事例。¹³⁾

察干喇嘛以邀请达赖喇嘛使节代表的身份为人熟知，其在满洲政权内的活动并不仅限于此。

-
- 6) 关于萨木鲁阿兴满殊习礼的其他活动，参见 齐克希：《锡勒图库伦旗喇嘛传汇典》，载《库伦旗志资料汇编第一辑》，库伦旗志办公室，1989年，第129-148页；若松宽：《锡勒图库伦旗喇嘛传汇典初探》，载《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97-411页。
- 7) 顺治初纂满文《太宗实录》天聪4年（1630）7月3日；《旧满洲档》，国立故宫博物院，1969年，第2993-2994页；第3742页；《满文老档》VI-太宗3，东洋文库，1962年，第325-326页；第729页；《内国史院档 天聪8年》，东洋文库，2009年，第139页等。
- 8) “库伦”蒙语语意为围起来的地方，一般意为帐篷群。
- 9) 关于移居今天库伦旗所在地的具体时期不详，仍需研究。
- 10) 顺治初纂满文《太宗实录》崇德元年8月戊子（17日）；《旧满洲档》，国立故宫博物院，1969年，第5030页；《满文老档》VI-太宗3，东洋文库，1962年，第1237页。
- 11) 石滨裕美子：《清朝とチベット仏教：菩薩王となった乾隆帝》，早稻田大学出版部，2011年，第50-53页。
- 12) ibid.
- 13) 胡日查：《清代蒙古寺庙管理体制研究》，第99-100页。

具体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1 察干喇嘛在太宗时期的主要活动]

时期	活动内容	出处
天聪10年2月	为与明朝进行交易，被派遣至杀虎口。	《旧满洲档》第4669页
崇德元年8月	满殊习礼呼图克图圆寂，作为吊唁使者跟毕力克圖囊素喇嘛一起被派遣至库伦。	《旧满洲档》第5030页 《太宗实录》卷30
崇德元年11月	被派遣至喀尔喀车臣汗。	《旧满洲档》第5318-5319页
崇德3年7月	贝勒阿巴泰因擅留喇嘛受惩。 <u>太宗将其喇嘛交于察干喇嘛。</u>	顺治初纂满文《太宗实录》卷42，崇德3年7月20日
崇德4年10月	作为使节被派遣至西藏。	顺治初纂满文《太宗实录》卷49，崇德4年10月7日
崇德8年	受清廷派遣与西藏使节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同赴西藏。	《五世达赖喇嘛传》卷1，第251页等

表中值得注意的是崇德三年太宗委托察干喇嘛管理犯罪喇嘛的事例。《旧满洲档》中也有名为“郭莽绰尔济喇嘛”（满文：gūmang corji lama）的藏传佛教喇嘛被太宗委托管理犯罪喇嘛的事例。¹⁴⁾ 该等事例同样散见于日后康熙年间的扎萨克喇嘛职务，¹⁵⁾ 故察干喇嘛等太宗时代受宠用喇嘛的活动就是后来的扎萨克喇嘛职责的雏形。

此外，《理藩院题本》收录的顺治年间题本中有关察干喇嘛职务的重要描述如下：

我老朽察干喇嘛，系太宗皇帝时逃避过来的。圣太宗皇帝为众生的利益，以外称为锡勒图库伦，以内称为古孟库伦（满文：gumeng¹⁶⁾ ni kuren），将在外的喇嘛班第等给予锡勒图库伦，将在八旗的喇嘛等给予古孟库伦，委任我担任扎萨克喇嘛 [的职位]。¹⁷⁾

其中察干喇嘛提到太宗时代有“内外库伦”，其本人以扎萨克喇嘛身份被担任管理八旗喇嘛的内库

14) 《旧满洲档》，国立故宫博物院，1969年，第5030页；《满文老档》VI-太宗3，东洋文库，1962年，第1237页。

15) 参见满文《朔漠方略》(beye dailame wargi amargi babe necihiyeme toktobuha bodogon i bihe, 京都大学图书馆藏)卷27，康熙35年7月甲戌；卷45，康熙36年8月辛卯（辛亥）。

16) “gumeng”一词，笔者尚不明其意，静待诸位学者指教。或许是藏文的郭莽(sgo mang, 意为“许多门口”)的音译，但同上述“郭莽绰尔济喇嘛”的满文拼写(《旧满洲档》: gūmang corji lama, 《满文老档》: g'omang corji lama)不一致，仍需研究。

17) “sakda cagan lama bi. taidzong hūwangdi i fonde ukame jihe bihe: enduringge taidzong hūwangdi. geren ergengge de tusa ogoro jalin. tule siretu kuren. dolo gumeng ni kuren seme gebulefi. tulergi lama. bandi sa be siretu kuren de buhe: jakūn gvsa de bisere lama sa be isabufi. gumeng ni kuren de bufi. mimbe jasak i lama sindaha.”，《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卷1，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15上-216上页。

伦。所述“内（满文：dorgi）”与“外（满文：tulergi）”的区别与八旗和外藩等清朝的基本组织结构概念有关。¹⁸⁾ 在入关前藏传佛教寺庙管理的基本制度和框架的同时代史料很少的情况下，该纪录提供的线索非常重要。太宗时代的“内外库伦”区分和喇嘛职务成为后来扎萨克喇嘛制度的重要基础。

二 扎萨克喇嘛制度的成立——顺治～康熙朝——

1643年，太宗皇太极驾崩，年幼的福临（满文：fulin 1638-1661）即位，即清世祖顺治帝。不久，清朝入关，迁都北京。本章介绍顺治年间清朝施行扎萨克喇嘛制度的过程。

如前所述，《大清会典》中关于扎萨克喇嘛制度的最早记载始于顺治十四年：“又题准，京师设四扎萨克喇嘛，盛京，西勒图库伦，归化城等处各设首领喇嘛，¹⁹⁾ 其下各设德木齐一名”。²⁰⁾ 这段时期有一个名为班第达诺们罕（满文：bandida nomon han）的西藏喇嘛，在京师藏传佛教界大显身手。班第达诺们罕以修建北京“一塔二寺”（即北海白塔、黄寺、普胜寺）而闻名。关于其身份，若松宽和齐克希根据成书于道光年间的《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认为班第达诺们罕与第3代锡勒图库伦扎萨克大喇嘛是同一人，但由于两位学者的主张无法通过同时代史料进行证实，因此学界仍然诸说纷纭。然而，近年出版的《理藩院题本》中有证明班第达诺们罕是第3代锡勒图库伦扎萨克大喇嘛的史料，从而结束了这场论争。²¹⁾ 据《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记载，班第达诺们罕本名是“西布扎衮如克（藏文：shes bya lhun grub）”。²²⁾ 太宗时代，在盛京与毕力克图囊素喇嘛一起负责修建四塔寺的喇嘛也是“西布扎喇嘛”，无疑二者是同一人。²³⁾ 任命班第达诺们罕主持修建庆祝顺治皇帝开始亲政的“一塔二寺”，很有可能是出于赏识其在盛京的功绩。

顺治九年至顺治十年，五世达赖喇嘛来访清廷之际，班第达诺们罕负责接待达赖喇嘛一行人。《理藩院题本》及其抄本《礼科史书》记载班第达诺们罕负责安排和管理在一塔二寺和怀来庙住持的喇嘛人事，²⁴⁾ 即与后来京城扎萨克大喇嘛的职责相同。

此外，顺治年间厄鲁特喇嘛内齐托音喇嘛（蒙文：neyici toyin 1587?-1653）被处罚时，清朝

18) 关于清朝的帝国内部结构和统治体制内部的内外区分，参见 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6页；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变迁为中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4-27页；杉山清彦：《大清帝国的形成与八旗制》，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第265-269页。

19) 在满文版雍正《大清会典》中，汉文的“首领喇嘛”相当于满文的“da lama”。

20) 康熙《大清会典》卷144，理藩院3，柔远清吏司。

21)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卷1，第62下-63上页；池尻阳子：《清朝前期のチベット仏教政策》，第50-65页。

22) 齐克希：《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第137页。

23) 沈阳北塔寺碑文，以及《内国史院档》，顺治元年6月19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4)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卷1，2010年，第10下-11上页；《礼科满文史书》，顺治10年4月22日文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把从内齐托音喇嘛处接收的众徒弟委托给班第达诺们罕带领的锡勒图库伦。²⁵⁾ 内齐托音喇嘛受东部蒙古诸部王公层的特厚信奉，那时其据点在科尔沁部内。²⁶⁾ 如前所述，入关前太宗时代，锡勒图库伦作为“外库伦”负责管理在外喇嘛班第。班第达诺们罕接收内齐托音喇嘛徒弟的事例说明太宗时代的“外库伦”职务至入关后仍然留置。

另一方面，察干喇嘛“内库伦”的情况不详。察干喇嘛随清廷迁都到北京后，在德胜门外修建的后黑寺任住持。²⁷⁾ 按照察干喇嘛的说法，依太宗时代的“内外”区别，应该由察干喇嘛负责管理京师内部藏传佛教喇嘛和寺庙。实际上，如前所述，真正负责京师藏传佛教喇嘛和寺庙管理是带领锡勒图库伦的喇嘛班第达诺们罕。原因可能是从崇德至顺治初期，察干喇嘛作为邀请达赖喇嘛的使节常常去西藏，平时并不在京师。另外，作为藏传佛教喇嘛，察干喇嘛也许比不上西藏高僧班第达诺们罕。²⁸⁾

顺治十四年以后清朝逐渐完善扎萨克喇嘛职位体系。到康熙朝末期为止，朝廷于京师、呼和浩特、锡勒图库伦、多伦诺尔 4 个地方建立以扎萨克大喇嘛为顶点的较大的金字塔式秩序体系，其他内蒙古各部及西安等地设置大喇嘛等职位。

此处考证清朝使用“扎萨克喇嘛”名称的原因。从设想“内外库伦”的事例可知，清朝对藏传佛教管理政策的方针基本上与清朝政权的基本组织结构同步。此外，锡勒图库伦的地位是准外藩扎萨克旗。如前所述，崇德末期至顺治初期，随着锡勒图库伦的重要性逐渐提高，将藏传佛教组织的首领称为“扎萨克喇嘛”合乎情理。

三 清廷对青海喇嘛的重用——清朝与青海东部寺院的联系

康熙朝后期，清廷邀请青海名刹佑宁寺（藏文：dgon lung byams pa gling）转生高僧二世章嘉喇嘛（藏文：lcang skya ngag dbang blo bzang chos ldan 1642-1714）访问北京，其后逐渐于清朝扎萨克喇嘛制度上确立绝对地位。此后，历代章嘉喇嘛作为大国师君临于清朝藏传佛教界的顶点，与章嘉喇嘛有因缘的青海高僧也陆续前往清廷。一般认为，清朝对青海喇嘛的重用始于二世

25) 关于内齐托音喇嘛和锡勒图库伦的因缘，乌云毕力格据《理藩院题本》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事件经过加以精确描述。详细内容参见 乌云毕力格：《关于内齐托音喇嘛相关的顺治朝满文题本》，载《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 3 辑，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 375-396 页；乌云毕力格：《内齐托音喇嘛与锡埒图库伦旗》，载《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 3 辑，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 375-396 页。

26) 若松宽：《锡勒图库伦旗喇嘛传汇典初探》，第 397-41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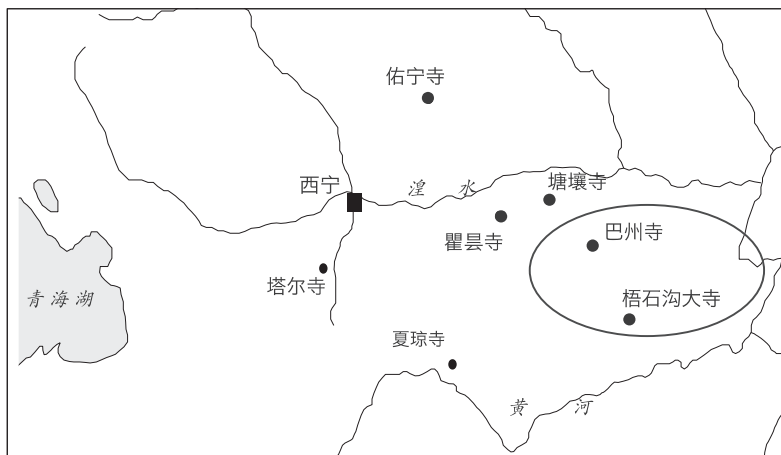
27) 《钦定日下旧闻考》卷 107，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 1774-1775 页。

28) 虽然班第达诺们罕于顺治初期负责“内外”两个方面的事务，察干喇嘛还是被清朝所信任的。在顺治十八年十一月礼部题“嗣后官民有为喇嘛班第者，悉令出京往察罕达尔汉绰尔济喇嘛处居住，并严禁妇女入庙焚香，违者治罪。从之”（《圣祖实录》卷 5）。从这一事例和上述察干喇嘛上奏的内容来看，察干喇嘛有可能担任顺治十四年设置的京师四位扎萨克喇嘛之一。康熙五年的《理藩院题本》里可见“普胜寺扎萨克喇嘛”一称，所以其余三位扎萨克喇嘛中的一位可能在普胜寺。如此看来，余下的两位扎萨克喇嘛很有可能在和普胜寺同时修建的北海白塔和黄寺，惜此说证据不足。

章嘉喇嘛，但这种情况早在入关后已经开始出现。本章主要介绍作为章嘉喇嘛访问清廷背景、清朝与青海东部藏传佛教寺院的关系。

从前2章的论述可以看出，在清初藏传佛教管理制度形成过程中，锡勒图库伦发挥了关键作用。日本学者若松宽曾指出锡勒图库伦的人才主要来自青海东部寺院。²⁹⁾笔者在他的研究基础上，通过研究近年来可利用的档案史料，论述锡勒图库伦和青海东部的关系，进而探讨其在清朝藏传佛教管理制度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锡勒图库伦和青海东部寺院关系可追溯到始祖萨木鲁阿兴满殊习礼，即他在青海东部的山沟里修建了一座寺院，称为梧石沟大寺(藏文:u shi brag dgon chen bshad sgrub chos 'khor gling)。³⁰⁾梧石沟大寺的修建时期不详，可能是自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期之间，萨木鲁阿兴满殊习礼移居东部蒙古之前时期。萨木鲁阿兴满殊习礼随后带领其徒弟移居东部蒙古，并在太宗的支持下创立库伦。其弟达尔汗囊素担任第2代，其侄阿兴锡勒图担任第4代锡勒图库伦扎萨克大喇嘛。据藏文历史书《黄琉璃教史》记载，阿兴锡勒图还在梧石沟大寺参与扩建寺院，可知锡勒图库伦依然与梧石沟大寺保持联系。³¹⁾



[地图 巴州寺和梧石沟大寺]

29) 若松宽：《锡勒图库伦旗喇嘛传汇典初探》，第397-411页。

30) 关于梧石沟大寺的起源，参见第悉桑结嘉措：《黄琉璃教史 (dga' ldan chos 'byung baid'urya ser po)》，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第339页；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安多政教史 (yul mdo smad kyi ljongs su thub bstan rin po che ji ltar dar ba'i tshul gsal bar brjod pa deb ther rgya mtsho)》，载 Lokesh Chandra ed. *The Ocean Annals of Amdo, Part I*, New Delhi, 1977年，第263下页。

31) 第悉桑结嘉措：《黄琉璃教史》，第339页。

巴州寺（藏文：bā jo'i dgon bstan pa dar rgyas gling）位于梧石沟大寺的西北20几公里处，与锡勒图库伦因缘颇深。巴州寺的始祖是塞臣绰尔济金巴嘉措（藏文：se chen chos rje sbyin pa rgya mtsho），亦称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蒙文：ilaγuγsan qutuγtu），以担任来访清廷的西藏使节代表为人熟知。虽然尚无确凿证据表明塞臣绰尔济与锡勒图库伦之间有无关系，据《如意宝树史》等史料记载，第3代锡勒图库伦扎萨克大喇嘛班第达诺们罕西布扎袞如克和第6代扎萨克大喇嘛默尔根绰尔济（藏文：me rgen chos rje < 蒙文：mergen čorji）与巴州寺有因缘。³²⁾此外，后代乾隆后期的清朝史料中提到“共十三世〔锡勒图库伦扎萨克大喇嘛〕皆系西宁所属弘善寺（巴州寺的汉语寺名）居住一族之图博图人”。³³⁾虽然文中将梧石沟大寺和巴州寺混淆，但足以表明作为锡勒图库伦的僧源巴州寺的重要性。

巴州寺和梧石沟大寺都处于湟水和黄河之间，即现在的青海省民和县域内。两座寺院的学僧去拉萨留学时根据规定同住一个宿舍，名为萨木鲁康村（藏文：bsam blo kham s tshan）。另外，梧石沟大寺的历代座主中有几位来自巴州。即，两座寺院有密切联系，这种联系不限于两座寺院之间，也包括瞿昙寺（藏文：gro tshang lha khang gau tam sde dge rgyas bde chen gling），塘壤寺（藏文：thang ring dgon dga' ldan bshad sgrub gling）等邻近寺院。17世纪中在青海东部地区塘壤寺相当兴盛，原来巴州寺也是塘壤寺属寺之一。³⁴⁾值得关注的是，二世章嘉喇嘛年幼时期在塘壤寺修养，其后赴拉萨哲蚌寺郭莽扎仓（藏文：'bras spungs sgo mang grwa tshang）时属于萨木鲁康村，跟同时留学的巴州寺喇嘛等有交流。³⁵⁾由此可知，二世章嘉喇嘛也属于包括巴州寺的青海东部寺院社会。也就是说，巴州寺和锡勒图库伦有密切关系，二世章嘉喇嘛生来与清朝藏传佛教界有因缘。清廷邀请二世章嘉喇嘛时，巴州寺的默尔根绰尔济担任北京扎萨克大喇嘛（管理京城喇嘛班第扎萨克大喇嘛）并非偶然。由此可见，清初以来的藏传佛教界和青海东部寺院的联系是二世章嘉喇嘛来访清朝确立绝对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³⁶⁾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介绍清朝扎萨克喇嘛制度以最初清朝藏传佛教界的成员和结构为基础形成的

32) 松巴堪布益西班觉：《如意宝树史》，载 Lokesh Chandra ed., *Pag sam jon zang*, Calcutta, 1908年，第346页；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安多政教史》，第214下页。

33) 《军机处档折件》：乾隆45年《叙述西勒图库伦之源流》档案，文献编号025219，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馆。

34) 松巴堪布益西班觉：《如意宝树史》，第346页；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安多政教史》，第214下页。

35)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安多政教史》，第70下-73上页。

36) 关于这些青海东部寺院和初期清朝关系的详情，笔者于第14届国际藏学研究协会研讨会（2016年6月19-25日召开，卑尔根）报告后，于《内秘書院モンゴル文檔案にみる17世紀アムド東部のゲルク派諸寺院と清朝》[日语]（见岩尾一史·池田巧编《チベット・ヒマラヤ文明の歴史的展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8年，第39-64页）发表。

具体情况。入关前，清朝势力范围仅限于辽东周围的时期，清朝以“内外库伦体制”为基本结构而管理领域内藏传佛教界。入关后，其领土逐渐扩大，清朝在每个据点设置领袖喇嘛职务，即“扎萨克喇嘛”（或“首领喇嘛”），委任管理其管辖寺院和喇嘛。由此可见，清初藏传佛教管理结构由“内外两库伦体制”过渡到作为“多库伦体制”的扎萨克喇嘛制度。

就其成员组成来看，扎萨克喇嘛制度成立当初，以太宗时期以来受清廷重用的锡勒图库伦的西藏僧为中心。锡勒图库伦喇嘛起源于青海东部寺院，包括与章嘉喇嘛因缘较深的寺院。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二世章嘉喇嘛驻京后的变化，本文认为二世章嘉喇嘛来访清朝的背景与清初以来的历史密切相关，所述扎萨克喇嘛制度的渊源和形成过程是有清一代扎萨克喇嘛制度的不可忽视的基础。

